

# 东北亚大国关系中第三方因素 及地区安全共同治理

杨鲁慧

[摘要] 中日关系经济上的合作依存度与政治上的纷争摩擦常态化这一结构性的矛盾日趋显现。从更深层次上探究中日政治经济所处的这种分裂状态根源,从本质上讲背后蕴涵着东北亚大国关系中的域外因素:即美国的第三方因素,其对东北亚的和平稳定发挥着特殊作用。东北亚大国在地区的竞争摩擦时常较为突出,但中美日在东亚地区还是蕴涵着许多重大的共同利益。东北亚传统的“管制型”安全模式需向大国共同“治理型”模式转变趋向,意味着大国区域安全治理的权利、利益、责任的平等与分享,地区安全治理是在大国协作框架下的共同治理,应注重大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关键作用。

[关键词] 东北亚地区; 大国关系; 第三方因素; 合作共同利益; 中美日安全合作; 大国共同治理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411(2012)04-0016-(9)

[收稿日期] 2012-02-1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当代韩国政治转型中的政党政治研究”(09YJA810012); 2011年获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研究项目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杨鲁慧(1956-)女,河南清丰人,山东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济南 250100)

冷战以来,东北亚地缘政治的稳定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东北亚一直是大国在亚洲竞争的主要乃至唯一关键性地区。”<sup>[1]</sup>中国的强劲增长及崛起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生机活力,同时也引发了中国的双边与多边关系中新矛盾、新问题。21世纪以来中日两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决定了双边频繁互动、力量此消彼长、依存与冲突并存的历史必然逻辑。东北亚的中日关系无疑是地区国际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是老牌的经济强国,一个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从国家关系的视角看,中日两国在国际体系中从单一的双边关系发展为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和战略互惠关系。但在中日外交战略互动中两国的战略互惠与战略分歧时有显现,经济上的合作依存度与政治上的纷争摩擦常态化这一结构性的矛盾也日趋凸显。从更深层次上探究中日政治经济所处的这种分裂状态根源,其本质是东北亚大国政治的背后还蕴涵着一个域外因素:即美国这一难以摆脱的第三方因素。东北亚大国关系中第三国的介入所构成的中日美三边关系,一方面体现了第三方大国的全球战略诉求;另一方面是中日两国缺失政治上相互信任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中日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对两国关系的成熟稳定有着特殊影响,对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发挥着特殊作用。在这一国际政治环境背景下,如何提高东北亚安全稳定和地区秩序的塑造力,是选择互信互惠还是摩擦冲突,怎样将中美日关系置于国际体系的参照坐标中进行战略定位,理性地认识把握中美日关系的政治互信与共同利益的基础,构建中美日地区安全“共同治理”管理模式的良性互动就成为研究的新命题。

## 一、再平衡:美国东亚战略调整的内在动因

伴随全球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东亚地区形成了梯次跟进和群体崛起的强劲势头,后危机时期的地区安全机制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期。“从历史发展来看,新兴大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削弱美国的绝对优势,而美国在能源、经济和伊拉克战争上的政策失误也加快了美国的衰落。此外,全球化发展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控制能力都提出了挑战,使非国家行为主体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这些都导致了美国单极时代的终结,并促进了国家权力的分散化。”<sup>[2]</sup>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对亚太战略进行调整,“重返亚洲”的动作频频,强推 TPP,参加东亚峰会,升级与东亚的同盟关系。其锁定目标很清楚,通过美国力量的介入和外交攻势,牵制、平衡中国崛起的力量和影响力,防止中国坐强亚洲与坐大亚太。美国的东亚地区“再平衡”战略是以“利益论”为根基连接与同盟国的双边关系,以“价值论”为基调重新整合东亚同盟体系,以“责任论”为基础对新兴国家施加战略利益的压力。

美国的政治强势和国际影响力日趋相对削弱,其权力地位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和质疑。基于历史上传统大国实力消长“权力转移”和“强国必霸”的逻辑推理,美国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担忧中国在亚太崛起大势的不可逆转性,会对美国构成权力挑战及安全秩序的威胁。“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重新崛起不言而喻是东北亚的一个战略问题。”<sup>[3]</sup>“在欧亚地区维持一个有利的力量平衡”被美国视为长期的国家战略利益与安全利益,而“亚洲新兴大国的崛起”(主要是中国)是未来 20 年可能出现的对这一利益的最严重的潜在威胁之一。<sup>[4]</sup>现实主义者认为,一个崛起的大国迟早要挑战霸权国和现有的国际秩序,甚至很可能为此发动体系战争。<sup>[5]</sup>为此,重建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再平衡”就成为奥巴马政府对外战略的新思维,并成为奥巴马政府防范和制衡中国崛起的重要筹码。美国的第三方域外因素利用东北亚盟国或地区性集团来打压或“均势”中国,并利用东北亚大国关系中的矛盾与摩擦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化、复杂化。正如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葛来仪所言“亚洲地区多数国家真心希望中国崛起,但是他们也越来越担心中国获得的空间大了点,需要来些平衡,扮演这个角色的最佳人选是美国。”<sup>[6]</sup>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也明确表态,“不能允许美国在这样一个如此复杂世界的任何地方缺席。”<sup>[7]</sup>“这种战略需要把政治、军事和经济三方面因素融为一体,而且前提必须是美国继续保持全球领导地位。”<sup>[3]</sup>从东北亚的视角看美国扮演了一种“离岸平衡手”的角色。<sup>[8]</sup>美国的《2010 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强调,“我们希望增强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力量和设施的适应能力以保卫和拯救我们、盟友和伙伴的资产和利益。”<sup>[9]</sup>2009 年 11 月奥巴马在日本发表亚洲政策演说中提出,美国与亚洲命运密不可分,今后将更多地参与亚洲事务,一方面美国要强化与盟国的关系,另一方面还要建立新的伙伴关系。重返亚太并要在该地区保持主导地位,并且承诺美国在亚洲未来的发展史上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由此可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再平衡”战略,主要是应对中国的崛起,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及政治影响力。

从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看,东北亚大国的权力博弈与地区和平稳定局势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深刻的启示和思考。冷战以来,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存在一直是这一地区的基本安全框架。而东北亚政治动荡和地区冲突危机升级的直接导火线,大多与第三方的大国介入相关,域外第三方大国的介入往往是祈求改变现有的地缘政治格局或传统的政治版图。冷战期间,这一地区存在着大国间进行的大规模鏖战和军事对峙,博弈的最终结局是:大国各方都为此付出了代价。当今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相互依存的大环境下,任何大国都难以承担由战争和军事冲突所带来的后果及高昂的成本代价。冷战结束后,20 世纪 90 年代朝鲜半岛发生了第一次朝核危机,从表层次上看仅是国际社会敦促朝鲜弃核的技术问题,但其背后隐含着当事国对域外大国因素战争忧虑,是对自身国家安全利益的一种战略防御。冷战结束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不复存在,美国的战略意图是急于改变朝鲜半岛的政治格局,并

曾乐观地估计在2003年前后通过美国等国的施压,朝鲜政权和社会制度将很快崩溃瓦解。而中国从中朝的特殊关系和地缘战略利益考量,要谋求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与和平,维护周边安全稳定是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国际环境,更是我们国家自身战略利益的关键所在。可见,东北亚地区对于美国的重要价值使得它必须争得域外第三方国家的合法化地位,并维护其在东亚的政治和军事前沿存在。因此,在东北亚的大国政治中现实主义就必然呈现一种主色调。

2010年以来美国作为第三方因素涵盖东北亚地区几乎所有热点问题。美国近期提升西太平洋紧张局势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并非偶然,其表明美国从阿富汗战争抽身后,它的全球战略重心开始向亚洲地区转移,扎扎实实地实践2009年曾宣布的将“重返亚洲,亚洲事务将在美国外交议程上处于更加显著的位置”<sup>[10]</sup>的承诺。2010年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就提出了西太平洋军力部署弹性化的战略思想,并奉行排他性制海权的“空海一体战”作战构想,把中国海军冲出“第一岛链”视为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影响力的重要标志。美国回归亚洲,这就意味着大国博弈的主战场移至东亚地区,并要强化与东亚联盟国的安全合作,这必然导致东北亚热点冲突问题多发。在政治上,通过“前沿性外交”与“进取型立足点”在亚太发挥领导作用。在安全上,继续强化东亚军事存在,在关岛打造二战以来美在西太平洋地区规模最大的军事基地,不惜消耗巨资进行最大的军事投入。近来东北亚局势又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向,日本和韩国利用相关的突发事件挟持美国,拉近美国介入的目的显而易见,倚借强势制衡中国。美国也利用各种偶发事件,继续强化与传统盟友的关系。

日本首相菅直人执政以来,保守势力占据主导地位,日本政坛右转趋向与美国政府的东亚“再平衡”战略的契合,无疑使日本在中日热点和争端问题上做出更激进的选择,为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又增添了不确定性及新的变数。2010年11月美日发表新的《日美共同宣言》,重新梳理日美作战合作面临的新课题,进一步推动双边防务合作深化。新的防务合作是以应对“假想敌”的中国在海上的“军事威胁”为目的,一旦台湾海峡有事时,美军航母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威胁。美国保守势力强调渲染美军驻扎冲绳可与日本合作监控中国海军动向的重要意义。<sup>[11]</sup>2010年9月发生的日本巡洋舰撞击中国渔船并扣押中国渔船船长一事同样被日本国际化,且拉拢美国介入实行军事威慑。在美韩军演烽烟未熄之际,美日又开启了以夺取海岛为目标设定的大规模实兵联合军演。美国之所以选择在黄海、东海及南海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标志着进一步密切美日韩军事同盟关系,以抑制中国的制海权能力建设,力阻把中国封锁于“第一岛链”的有限空间中,围堵中国的海洋战略。2012年美国的国防新战略再次聚集东亚。1月26日美国公布的财政年度军事预算发出的信息是,美裁军10万,但在东亚的军力反而增强。扩大美国军队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强化美菲军事同盟关系,并宣布了美国在澳大利亚驻军的计划和在新加坡增加部署军舰的计划。美国的东亚新军事战略已经进入实施阶段。<sup>[12]</sup>美国需要向东亚地区显示它的军事优势,在心理上挤压新兴国家的政治空间与承受能力。

东北亚地区大国间的摩擦冲突不断,从敏感的领海主权纷争到系列军事演习乃至朝鲜半岛炮击事件,这些矛盾摩擦既体现了东北亚大国既有的利益冲突,同时也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和对东亚地区实施“再平衡”的集中反映。从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的考量看,反映了东北亚各大国间期望借助美国力量来恢复地区力量平衡的心态。中美日之间出现这种新的紧张关系是由以上几个典型事件和几个持续问题串联起来的,紧张状态背后反映的是东北亚大国间日益突出的战略互信问题。

## 二、利益互构:中美日大国关系的合作基础

21世纪以来,东北亚地区引发了一系列大国权力政治博弈的理论性命题,它几乎覆盖历史和理论层面上可能导致冲突对抗的所有因素,使这一地区的安全稳定更具有不确定性和充满变数的几率提升。从“新兴大国崛起”到“崛起大国权力变更”;从领土主权纷争到海洋权益维护;从历史问题到现实



身份认同;从民族主义思潮到政治制度的转型;从能源安全到海洋运输保障等等,都体现了东亚地区多元文化与历史背景及民族个性的差异性。这些不能不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和关注。

当今国际格局的主要政治权力中心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世界不再因为东西方冲突而胶着在一起,世界在很快地散开。它将是一个区域化的世界,呈现出特有的区域间行动集结体。”<sup>[13]</sup>东北亚主要大国在现实安全的思维框架中,探寻新一轮的大国安全战略调整。全球化时代的美日中大国关系及矛盾,不可盲目地归纳为“领导者—支持者—挑战者”的简单矛盾公式,而是具有一种“既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又体现了权力政治的矛盾”的“双重结构”。<sup>[14]</sup>传统大国关系中那种以利益取向和价值观及认同的趋向统一作为界定敌友关系模式,已逐步被共同利益依赖和竞争冲突存为一体的错综复杂关系模式所取代。前者是谋取在大国的相互博弈和制衡中获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后者谋求在合作与竞争中互利共赢的非零和博弈。“这种新型的大国关系模式,姑且称之为博弈型大国关系。其内涵和特点是合作与竞争(抑或斗争)并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大国间博弈呈现出低强度对抗和总体理性的特点,并在纠结中缓慢发展。”<sup>[15]</sup>中日美构建博弈型大国关系,应避免互为最大对手的可能性。大国战略的竞争是以制胜共赢为最优目标选择,如果大国间为权力和利益最大化而战,美日感到中国的崛起必定挑战或颠覆自己的国际地位,中国忧虑日美必然遏制大国的崛起。这样的结果就使得那些能够通过共同行动和对话沟通解决的地区政治安全问题,也势必跟着进入大国间的零和战略博弈的视域。地区秩序将处于巨大的政治风险之中。

2010年以来,中日美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矛盾摩擦层面不断增多,战略竞争的负面影响不断显现,似乎东北亚地区安全稳定的忧虑都在加大。一系列事件背后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中日美关系的碰撞摩擦引发的。这一切到底是怎样发生的?中日美在东亚地区究竟有没有共同利益基础?日本菅直人内阁上台以来,积极配合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再平衡”战略。在钓鱼岛海域发生的撞船事件中,尽管激化了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矛盾,导致两国关系的再次逆转。但中国和日本作为国际体系的重要行为体,两国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决定了双边频繁互动的历史必然性,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建设也是当代东亚大国关系依存互构的必然结果。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同盟和前沿军事存在一直是东北亚政治安全的基本框架,并以双边军事同盟条约构成以美国强权政治为核心的辐射区域。这些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使得美国至少在军事意义上成为东亚政治的一部分。<sup>[16]</sup>由此美国也成为东亚地区的“海上亚洲”和“海上国家”。<sup>[17]</sup>可见,东亚地区对于美国来说是重要的政治经济战略利益地带。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麦考密克一语道破美国与东亚地区的相互依存关系:“目前的危机表明,在当今贸易投资全球化的时代,太平洋两岸的经济——我们的繁荣——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正如亚洲的成功有赖于蓬勃发展的美国一样,保持美国强劲的经济增长也需要一个强大和不断发展的亚洲。”<sup>[18]</sup>中日美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经济模式上有很大的差异,并在亚太地区竞争摩擦的一面有时还比较尖锐突出。但鉴于中日美三国的特殊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力以及与其他盟国错综复杂的关系,全球性和地区性的政治安全事务已离不开这三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态度与作为了。“美国人说,今后是‘美国的亚太世纪’。如果把中国排除在外,或者与中国对抗,哪来‘亚太世纪’?尽管美国的亚太、亚洲战略是对着中国的崛起而来的,但我们没有必要与它争雄,更没有必要与它对着干。”<sup>[19]</sup>如果是中美对抗的“亚太世纪”,就不可能是繁荣发展的“亚太世纪”。中美日三国之间在彼此的成功与增长及崛起过程中有着巨大的利益所在,而且从这些大国关系的背后看,它所蕴涵的战略意图和政策选择意义极为重要且深刻。中日美在东亚地区蕴涵着许多重大的共同利益,具体表现为:

第一 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中日美三国的共同利益。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地缘政治的活力逐渐向亚太地区的核心地带东亚区域转移,这就意味着世界权力中心从西方将转移到东方,政治影响力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并不断改变着国际政治格局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而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开

始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中心区域,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事关战争与和平的事件,必将对中日美三国及国际社会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1997年曾提出,“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关系到美国的根本利益。小布什时期中美联手反对台湾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维护了台湾海峡的稳定,也是这种共同利益的体现。”<sup>[20]</sup>中国的和平发展加快和深化了亚太新兴国家群体的再次崛起趋势,权力资源的重新选择与再分配,意味着权力转移的成本和代价是高昂的,是一个艰难的适应与摩擦过程。从中国的经济崛起 to 摩擦崛起再到完成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标志着中国因实力增强形成了主动构建国际外部环境的能力。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政治经济相互依赖度日趋加深,大国的崛起关键取决于对现实利益的考量和与传统大国之间相互利益的协调。因此,“中国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与美国围绕国际规则和领导权的暴力冲突。”<sup>[21]</sup>“中国的崛起对美国不构成挑战,而是宣告回归中国卓尔不凡的那种常态。”<sup>[22]</sup>从根本上说,新兴大国的崛起,是在现有世界秩序下的崛起,是现有世界秩序的受益者。新兴大国力量的发展,从总体上说,将巩固和增强现有世界秩序中的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合作。<sup>[23]</sup>在权力资源变更的背景下国际秩序面临的挑战是,竞争的双方在何种程度上互信、互利、互惠。东北亚大国关系中的任何一方都将无法主导对方,而冲突将造成两败俱伤,这是中日美关系最重要的基本现实。因此,东亚地区的军事冲突及和平局势逆转对任何大国都不会带来全赢的结局,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寻求大国间的共同利益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唯有如此,地区大国才能从安全稳定环境中获取和分享由此带来的赢利。

第二,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繁荣,构建亚太“利益共同体”符合中日美三国的根本利益。尤其是在亚太地区和东亚地区的利益,是大国各自的国家利益关键之所在。中美日分别地处太平洋两岸,东亚地区是他们最集中的利益汇合地带,并拥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责任。这三个大国关系究竟是选择合作还是对抗,是相互包容还是相互排斥,是做伙伴还是做对手,这些选择的动向始终牵动着亚太地区和世界政治格局的未来发展,关系到地区和全球的安全与稳定。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以及大国间已形成的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的局面,推动了大国在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的逐步提升,也是一个与地区经济繁荣在利益和观念上结合得更为紧密的过程。由于中美日国家经济贸易的相互依赖性,导致美日的重大利益所在,也是中方的重大利益集中体现。美日国家经济要稳定发展,中国的作用不可或缺。由此揭示了中美日国家关系具有非零和及非对抗的特征。博弈型的大国关系因利益的捆绑有效地抑制对方难以采取对抗冲动,降低实质性冲突程度的概率。这不仅涵盖大国经济贸易关系上的合作共赢问题,也关系到太平洋两岸经济的发展繁荣需要一个稳定的地区环境。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美国对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超过了对欧洲的贸易和投资,亚太地区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据美国普查局统计,美国对华贸易“1990年突破100亿美元,2002年突破1000亿美元,2005年突破2000亿美元,2008年达到2680.4亿美元。从2000年开始,中国就取代日本稳居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来源地之首,且所占比率持续上升,从当年的19.22%上升至2008年的32.84%。”<sup>[24]</sup>2007年,“美国向东亚地区的商品出口达到2015亿美元,占美国总出口额的25%。同年,美国在东亚的直接投资总量达到了4540亿美元,而东亚在美国的投资总量达到了3200亿美元。即使抛开美国和中国、日本之间密切的经济关系,近年来它在东南亚的商业和能源利益也在不断增加。东南亚地区是美国的第六大出口市场,美国也是该地区的第二大投资国家。美国最大的五个出口市场中有四个为APEC成员。”<sup>[25]</sup>扩大出口、增加就业是奥巴马政府经济议程的重中之重。而出口国主要是亚太地区的中日韩国家。“奥巴马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扩大出口战略,其目标是要在未来五年内将出口翻一番,带动200万人的就业,并确定了‘国家出口计划’。”<sup>[6]</sup>

经济交往的深化和依存度及扩大趋向,有助于缓解中日美大国之间的认知冲突和地缘政治的摩

擦。因此,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与繁荣是东北亚大国矛盾冲突缓解的利益驱动器,对中日美大国关系的战略调整也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和亚太地区合作机制建设符合中日美大国的共同利益。东亚地区一体化建设和亚太地区合作近年来已成为国际政治学界和政治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是全球新兴经济体最为集中的地区,其核心地带东亚地区已呈现巨大的增长活力与发展动力,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东亚地区合作的性质与趋向及基本架构一直是世人关注的重要议题。由于东亚地区的合作方关系到不同的国家行为体,从地缘政治上讲涉及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等国家,但美国因素始终是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是东亚合作进程中的基本特点。尤其是2010年奥巴马政府重新调整亚洲政策后,这个特点更加突出,并成为地区一体化建设中的核心变量关系。这些因素大大增加了东亚合作的复杂性及多元化,也使一体化进程出现了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实力在东北亚地区有重大影响,并与美国在利益上具有重大相关性。“日本和美国有着特殊的同盟利益关系,韩国和美国有着保护和被保护的利益关系,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海外市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对美国来说,中美关系将影响到美国全球战略的平衡,《美日安保条约》是美国在远东地区存在的基石,美韩军事合作则关系到美国在朝鲜半岛和远东的军事影响力,所以,中日韩三国关系的演变直接影响美国的核心战略利益。”<sup>[26]</sup>对于东亚大国关系中任何影响到美国利益的动态和举措,都将引发美国的高度关注和极度警觉,反映了美国在这一地区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意义及强烈的干预意愿。

多年来美国一直把东北亚大国置于全球战略棋盘上的重要地位,并以此为依托塑造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了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战略利益的长期存在,并从地区经济繁荣发展中持续获益,奥巴马政府近期又实施新的重大战略部署和主导,除有限度支持次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把力推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作为亚太地区合作的战略重点。跨太平洋的一体化进程,标志着美国的战略重心已具有向亚太转移的实质性部署。美国的基本考量和战略意图,是在APEC框架中重点打造TPP,压缩中国的战略发展空间,形成一个以美国为领导核心的跨太平洋经济合作机制,重振美国在东亚及整个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更有效地塑造美国的权力结构和维护国家利益。就中美关系而言,都视亚太为自己重大地区利益所在,并在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深远,双方都有多种手段制衡对方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同时双方都有能力阻挠对方实现在本地区的利益目标。因此,当前全球性的特别是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事务,唯有中日美共同联手治理方能解决问题。

### 三、共同治理:东北亚大国安全合作机制的路径选择

后冷战时代的东北亚安全问题是国际关系中最复杂、最敏感,也是最有全球性战略意义的政治领域。冷战时期的热点问题不仅没有降温,反而冲突摩擦继续深化,朝鲜半岛的核问题就是典型案例。在东北亚地区既存在传统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又面临恐怖威胁、环境恶化、金融危机等非传统安全的新课题。2010年美国重返亚洲后,提出美国的亚太战略重点目标是:经济繁荣稳定,地区和平稳定,盟国安全稳定。这些多层面的安全威胁必然导致东北亚区域安全变数的不确定性因素上升。而且这一地区集结了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大国。而东亚作为大国关系集中的区域,恰恰又缺乏大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认同,<sup>[27]</sup>缺失一种区域性的政治安全制度安排,缺乏不同民族之间的“共同体”建设。由此造成东北亚的安全既没有自由制度主义的支撑,也没有精神和价值理念上统一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sup>[28]</sup>未来的东北亚究竟要打造出什么样的安全体系?是欧盟版?还是美国霸权秩序下的脆弱和平?还是海权大国与陆权大国之间不稳定的“均势”,这就不能不成为东亚国际政治关注的焦点之一。



东北亚大国关系利益协调的机制化欠缺,地区安全合作制度的缺失,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缺乏彼此的信任度,大国间的政治互信及相互尊重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信任和尊重及理解是国家间互动协调的重要变量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国间的关系是选择合作还是对抗,其中相互信任的建构是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后冷战时期,以国家利益和权力为中心的东北亚大国关系,依然充满着战略猜忌和相互防范及不断地摩擦冲突。不相信对方的崛起是和平发展,“假想敌”、“威胁论”、“战略防范”和超常规军演就成为东北亚地区安保政策的主旋律。其后果必然导致国家间信任的再度缺失,反映了国家间信任关系基础的脆弱性。在政策考量和危机事件处理上自然就会采取强硬的抗争及不妥协态度和立场,这就是为何东亚国家一旦发生冲突危机态势,第三方国家必然介入并使当事国受到极端情绪的影响,由此陷入恶性循环怪圈的关键所在。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合作安全和综合安全理念的引入,东亚地区的安全实践呈现出多种安全模式并存的鲜明特点。一是,传统的同盟安全在东亚地区仍然大行其道。“美国将双边军事同盟当做提供给地区和平所必需的‘公共物品’来换取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sup>[29]</sup>东亚许多国家与美国结成同盟关系或准同盟来求得安全保障。以美国为核心的同盟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功能性的甚至是工具性的,导致东亚地区安全始终处于一种脆弱的和平状态。二是,新型的多边安全合作方兴未艾,各种不同轨道的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相继建立。因此,对东亚现有不同安全合作模式的性质和功能进行比较分析,对于东北亚安全区域治理机制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一,“霸权稳定”(支配模式)。某个超级大国或占主导地位的“领导者”主导、控制下的安全格局。其二,力量均势(竞争模式)。其形式或调解手段往往依赖军事同盟、核威慑与常规威慑等。这种模式在东北亚地区最有可能,也最接近现实。其三,合作安全(协调模式)。以培育东亚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通过各种区域或次区域安全机制开展多边合作。

就现实状况而言,前两种安全模式蕴涵着巨大的风险和昂贵的成本代价,显然不能令人满意。更为甚者其将造成东北亚国家间的互信危机,致使同盟体系外的国家在战略上相互猜疑,事实证明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东北亚地区安全稳定的必由之路,只有通过多边合作安全逐步建立和完善地区安全机制,才有可能真正走出东北亚的安全困境。冷战结束以来,崛起的新兴国家由国际政治经济的边缘逐步走向国际政治舞台中心,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作为国际权力结构的三大重要力量并存合作与发展,构成世界政治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安全威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原有大国,还是新兴国家都无法独自应对新的安全威胁;它们必须进行合作,以求共生共荣。”<sup>[30]</sup>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为构建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提供了契机。当今东北亚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区域安全治理的需求持续增长与地区安全治理制度供应短缺之间的矛盾。地区安全合作制度构建的核心要素是:变革、转型、建设,这也是促进和推动中美日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合作的重要领域,这种安全合作治理将决定着东北亚未来的秩序规范。我们要把握认识两点基本现实:一方面由于中日美大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利益的优先次序有所侧重,另一方面,东北亚大国间的合作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和战略诉求。“全球体系在经历着转变过程,这一过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时期相类同。当时与现在一样的是一场巨大的全球冲突走到了尽头,当时与现在一样的是国际政治在重新塑造。”<sup>[13]</sup>

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没有统治的治理”被广泛应用于国际金融、国际政治和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标志着全球化进程为人类政治生活和理念思维带来了重大变革。“治理与统治不同,是一种有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种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未必一定要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因而,与政府的统治相比,治理的内涵更丰富,它是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然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sup>[31]</sup>“治理是一种以协调而非控制为基础的政治管理过程,治理不是一种静态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sup>[32]</sup>治理不同于管制,“如果说管制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刚性的

制度设计,那么治理则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柔性的能力建构。它包括调动和安排不同行为体的能力、整合并有效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平衡与协调不同利益关系的能力以及达到特定政策结果的能力。”<sup>[33]</sup> 建设中日美三国间地区安全共同治理的对话机制势在必行,但这种共同治理必须是对等、公正、协商的关系,而不是以日美联盟力量遏制和对抗或“围城”中国,大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也不应当成为敌人或潜在的敌人。

后冷战时代的东北亚地区是一种以美国为主导、双边军事同盟为基础、多边机制为补充的“管制型”安全模式,其本质体现为缺失区域完整性及无法保障各国利益分享的霸权稳定体系。而东北亚大国在地区安全合作的治理中,一方面主张区域安全治理的权利、利益、责任的平等与分享,即强调按照地区多数国家的意愿塑造地区安全秩序,另一方面又主张这种治理应该是大国协作框架下的共同治理,突出了大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关键作用。通过这种合作安全框架,最终形成一个由大国推动的共同治理局面,保障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有效管理地区安全事务。在全球共同治理模式下,东亚地区的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也呈现从传统的“管制型”逐步走向现代“治理型”的新态势,这既带来大国关系的新命题,也拓展了深化国际政治领域的新空间。冷战时期美国主导的“管制型”同盟安全模式已无力担当东亚安全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东亚应培育建设共同与多元“治理型”的安全合作机制,即中日美大国间的安全合作需从“管制型”转向“治理型”的共同管理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说,前者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刚性的制度性安排和战略诉求,后者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内在的能力建设与平衡协调关系。东北亚大国间安全合作中的“共同治理”是新的安全理念、安全机制和安全能力建设的集中反映,它是整合并有效利用大国关系中的最大公约数,缓解地区安全治理需求与国际制度供应不足的矛盾,促使地区安全机制建设与和平稳定战略需求保持于良性平衡状态中。

东北亚大国的传统“管制型”安全模式逐步向共同“治理型”模式转变,它超越了现实主义理论为基础的“霸权博弈”游戏规则,实现了“和合博弈”的政治法则,这也是各大国在东北亚安全合作中共同治理机制建设中的基本规范和准则。在东北亚中美日大国间的安全合作是这一地区保持稳定安全的关键要素,有效解决地区安全合作中由于主导权的猜疑带来的信任缺失,并能积极化解中国的重大安全关切问题。在地区大国的安全治理机制中,关系到地区安全中的重大问题要与相关国家平等协商方可,尽管美国参与其中并依然是重要的政治砝码,但不再握有唯一的话语权,单边主义被多边主义的平等协商所取代。这是一种多边制度化设计和制度化安排及制度化建设的过程。它同时也佐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当地区有了共同的安全关切,才会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并成为利益攸关者,才能产生共同的政治认同感,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有共同协商解决问题的利益诉求和可能性。因此,一个各方都需要的地区安全共同治理机制,在解决东北亚和平稳定的重大问题上不失为一种战略抉择。

#### 参考文献

- [ 1 ] [美] 乔纳森·波拉克. 变化中的政治和军事环境: 东北亚[A]. 扎勒米·哈利勒扎德. 美国与亚洲——美国新战略和兵力态势[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1: 84.
- [ 2 ] Richard N. Haass. The Age of Nonpolarity [Z]. *Foreign Affairs*, 87: 3, May/June, 2008.
- [ 3 ] [美] 扎勒米·哈利勒扎德. 美国与亚洲——美国新战略和兵力态势[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1: 88-93.
- [ 4 ] Joint Statement of William J. Perry and Stephen J. Hadley before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Hearing on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Independent Panel[R]. Washington, DC. July 29, 2010, p. 2.
- [ 5 ] [美] 肯尼斯·华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M]. 信强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O. F. K. Organski and Jacet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 6 ] 杜兰. 美国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战略论析[J]. *国际问题研究* 2011 (1): 50-56.
- [ 7 ]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view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 A Conversation with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R]. May 27, P. 13.



- [ 8 ] 王义桅 唐小松. 大国政治的悲剧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悲剧[A].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 大国政治的悲剧[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8.
- [ 9 ] Department of Defence ,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R]. February 1 , 2010 , P. I , 66.
- [ 10 ] (美)希拉里·克林顿. 美国重返亚洲, 强烈冲击东亚国家[N/OL]. 中国时报, 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cn/hb/2010/08-06/2452411.shtml>.
- [ 11 ] James Holmes . Japan's Ryukyu Island China in China's Island Strategy [J]. China Brief : 2010 , ( 10 ) : 18.
- [ 12 ] 陈一明 王明军. 美国裁军腾手挤压中国[N]. 环球时报 2012-01-29(1).
- [ 13 ] (法)恩斯特·奥托·岑皮尔. 变革中的世界政治[M]. 晏扬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引言 20 , 引言 18.
- [ 14 ] 李少军. 如何看待当前的中美关系[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11-04.
- [ 15 ] 刘强. 新型大国关系下的国际安全[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11 ( 1 ) : 2.
- [ 16 ] 孙立华. 美军驻东亚基地网备受关注[EB/OL]. <http://www.defence.org.cn/article-1-44538.html>.
- [ 17 ] Robert Ross . A Realist Policy for Managing US - China Competition [EB/OL]. Policy Analysis Brief , November 2005 , p. 5. <http://www.stanleyfoundation.org/publications/pab/pab05china.pdf>.
- [ 18 ] 蔡贵利. 中国不必担心美国重返东南亚[EB/OL].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100112/10507229717.shtml>.
- [ 19 ] 张蕴岭. 对美要打太极拳, 而非拳击[N]. 环球时报 2011-12-03(7).
- [ 20 ] 陶文钊. 亚洲的合作大于竞争[N]. 环球时报 2011-01-20(14).
- [ 21 ] G . John Ikenberry .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Z]. Foreign Affairs , 87: 1 , Jan/Feb2008.
- [ 22 ] (美)基辛格. 防止美中发生冷战[N]. 华盛顿邮报 2011-01-04.
- [ 23 ] 朱锋. 新兴大国的合作机制建设[J]. 当代世界 2010 ( 11 ) : 8.
- [ 24 ] U . S. Census Bureau Statistic [EB/OL]. [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Press-Release/ft900\\_index.html](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Press-Release/ft900_index.html). 阮建平. 经济与安全“再平衡”下的美国对华政策调整[J]. 东北亚论坛 2011 ( 1 ) : 62.
- [ 25 ] Myron Brilliant , Murray Hiebert , Robert Reis and Jeremie Waterman , "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East Asia Fac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 , the U . S. Chamber of Commerce 2009 , p. 5. p. 19. 宋伟. 试论美国对亚太区域合作的战略目标和政策限度[J]. 当代亚太 2010 ( 5 ) : 8.
- [ 26 ] 秦亚青. 东亚地区合作: 2009[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309-310.
- [ 27 ] 魏志江. 中日韩三国的战略信赖度分析[J]. 东疆学刊 2011 ( 1 ) : 81.
- [ 28 ] 朱锋. 国际关系理论与东亚安全[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序言 1-2.
- [ 29 ] 张东宁. 东北亚国家安全体系: 从双边困境到多边合作的安全路径分析[J]. 东北亚论坛 2010 ( 2 ) : 61.
- [ 30 ] 秦亚青. 世界格局、国家制度与全球秩序[J]. 现代国际关系 2010 ( 庆典特刊 ) .
- [ 31 ] (美)詹姆斯·罗西瑙 张胜军. 没有政府的治理: 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M]. 刘小林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5.
- [ 32 ] Commiss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urhood[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5. pp. 2-3.
- [ 33 ] 崔顺姬 余潇枫. 安全治理: 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范式[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0 ( 1 ) : 88.

(责任编辑 李英武)

## The Third - Party Factor of Great Powers in Northeast Asia and the Common Governance of Regional Security

YANG Lu - hui

**Abstract:**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normalization of political disputes and friction in Sino - Japan relations is a pair of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To explore the causes of contradiction in the politics and economy of Sino - Japan relationship more fundamentally , there are extra - regional factors in Northeast Asia power relations. The U . S. as a third - party has played a special role in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Northeast Asia. Competitive friction in the region of Northeast Asia is more prominent. However , China , the U . S. and Japan still have many important common interests in East Asia. The trend of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control - type of security model to governance - based security model of great powers in Northeast Asia means that the rights , interests , and the responsibility will be equalized and shared i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among great powers. The reg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is a co - governanc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powers' concert , and ought to focus on the pivotal role of great powers in regional security affairs.

**Key Words:** Northeast Asia ;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 the third - party factor ; common interests ; Sino - U . S. - Japan security cooperation ; common governance of great powers